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立足新发展阶段 确保“十四五”开好局

■ 胡 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2021年，我们要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见到新气象，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本月中在北京召开，这是年终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2020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战略定力，准确判断形势，精心谋划部署，果断采取行动，付出艰苦努力，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2021年，我们要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见到新气象，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因此，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如何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怎样的部署，确定什么样的重点工作，尤为值得关注，需要认真理解和把握。

强化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

即将过去的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为不寻常的一年，每一个中国人都会铭刻下永难忘却的记忆。

事非经过不知难。在“十三五”规划即将收官之年，又是党中央兑现对全体人民的承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病毒突袭而至，疫情来势汹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面临严重威胁，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

面对严重疫情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紧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决心，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经过8个多月顽强奋战，付出巨大努力，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铸就了伟大抗疫精神，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

与此同时，党中央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准确把握疫情形势变化，立足全局、着眼大局，及时作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加大宏观政策应对力度，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制定一系列纾困惠企政策，出台多项强化就业优先、促进投资消费、稳定外贸外资、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激发发展新动能等措施，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复商复课，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产生活。国民经济在经过一季度短暂快速下行后，在二季度就实现V型反转，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0.7%，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充分彰显了中国的强大修复能力、厚实的制度优势和旺盛的生机活力。

党中央还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推进脱贫攻坚，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12月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庄重宣布：经过8年持续奋斗，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充满底气地指出，“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即将完成。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又跃上新的大台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

前不久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科学判断，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基于对形势的准确研判，五中全会清晰描绘了2035年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发展目标、重大战略和重要任务，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展现了一幅更加美好的画卷。

“明者因时而变”。党中央要求，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战胜挑战就是抓住机遇，克服危机就是赢得转机，趋了利就是避了害。

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强调指出，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明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因此，既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提高风险预见预判能力，严密防范各种风险挑战，又要坚定必胜信心，办好自己的事。只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抗击大风险中创造出大机遇，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

突出“三个新”稳步开好局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扎实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既要以优异成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又要为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更为扎实的物质基础和信心基础。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强调了“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三个新”，这是五中全会提出的规划建议的逻辑主线和核心要义，“三个新”是“一体三面”，也是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的思想主干。

在深刻总结了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五个方面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明年必须抓好的八个方面重点任务，其中突出的亮点表现在——

一是强调“双侧改革”，将“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并重提出。会议强调，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改革。近几年，我们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和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有效改善了供求关系。当前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要将着力点立足国内，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必须高度重视需求侧管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始终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切实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各种堵点淤点，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二是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尤其是要突破技术“卡脖子”困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会议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也暴露出我国科技创新基础还不牢，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创力还有待提高，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亟需从根本上改变。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按照五中全会精神，下一步国家要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核心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核心关键产业方面取得新突破，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产业链供应链。

三是强调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今年为应对疫情，我们顺势采取了强力度的财政货币政策，实施逆周期调节。明年随着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态，宏观经济政策可能会回归到正常水平。但中央依然强调，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与此同时，要着力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针对近年来平台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一些新的问题，会议明确，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强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会议继续坚持“房住不炒”政策，要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坚决遏制大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态势，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从讲政治的高度开展经济工作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们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经验，也是我们显著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十九届五中全会突出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要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适应新时代新要求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水平和专业化能力，特别是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打造政治过硬、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

在今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作的重要讲话中，将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应对当前复杂形势、完成艰巨任务的迫切需要必须提高的能力，具体化为“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这“七个能力”。

总书记尤为强调，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善于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真抓实干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到经济工作各方面。”“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成为领导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行家里手。要增强补课充电的紧迫感，自觉赶上时代潮流。”这前后表述的含义是一脉相承、意味深长的，也是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必须着重把握的。

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领导者只有确保具备过硬的政治能力，自觉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才能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保持政治定力，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按照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勠力同心，砥砺前行。

文化观察

讲好中国故事 提升文化传播力

■ 郭振雪（肇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增进中华文化的国内传播，创新推进国际传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是新时代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

新时代的中华文化传播需要“以讲代说”，即用讲故事的策略和艺术替代传统的说教方式，提高中华文化传播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多用外国民众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的途径和方式，积极传播中华文化，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世界对中国多一分理解、多一分支持。”这一重要指示，为提高中华文化的传播力指明了方向，即中华文化传播要擅长用中国故事阐发中国精神，解释中国元素，让中华文化生活化、生动化、具体化，使受众在“润物细无声”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精妙之处；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需要在中国故事中引入世界流行语言、世界元素和时尚元素阐释世界主题，运用海外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载体、话题等元素来传播中华文化。

在全媒体时代，提高中华文化国内与国际传播力需要借助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加速融合的趋势与优势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和传播载体，着力扩大中华文化传播的覆盖面，增强中华文化传播的渗透力。“要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从相加迈向相融，从“你是你、我是我”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变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是目前形势下提高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的重要途径。

中华文化传播要正确处理雅和俗的关系，做到雅俗共赏。中华文化传播向来有大俗和大雅之分，在客观、准确把握国内外受众对中华文化的需求偏好、规律和特点的基础上，实现大俗和大雅的贴切转化、相通相融，在雅俗共赏中提升中华文化传播的深度和温度。

以精准传播和定向传播为导向

中华文化传播的本质是中华文化在国内外传播客体间的传递、交流与互动。中华文化传播要以精准传播和定向传播为导向，强势传播和柔性传播相结合，最大限度满足国内外受众对中华文化的不同需求。

传播客体对中华文化的需求是文化产品创作的不竭动力和源泉，而不同社会阶层的受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偏好和特点大相径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出能够从不同层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是提高中华文化传播力的根本与前提。

文化传播要有的放矢。以群众的文化需求偏好、特点作为文化产品创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实施精准传播、定向传播的科学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提高中华文化国内传播力最根本的一条，是传播主体“走基层、接地气、转作风”，放下身段、耐着性子、带着感情深入不同的社会阶层、领域进行调研，察民情、知民意、通民心，为中华文化产品创作及其传播提供民心所向和民意所属。

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则需要明晰国外传播客体对中华文化的关注点、兴趣点和兴奋点。近年来，随着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不断发展，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在不断提高。中国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发展观、“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思想与理念既有鲜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烙印，又表现出普遍性的世界意义和价值，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同、响应和支持。以精准传播和定向传播为导向，强势传播和柔性传播相结合，设身处地更换和匹配传播内容，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在国外受众中的认可度、接受度、影响力和感染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效能。

汇聚中华文化传播的强大合力

提高中华文化传播力需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文化企业、专家学者及不同社会力量在文化传播中的功能和作用，汇聚中华文化传播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强大合力。

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加强和改善党对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中华文化传播的主动权和领导权，是汇聚中华文化传播的强大合力的核心与关键。

中华文化传播是一项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性、综合性工程，充分发挥各类文化企业在中华文化传播中的主观能动性也至关重要。中华文化传播还需要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尤其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中华文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形成“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之势，以此鼓舞人民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文艺工作者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使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

总之，我们要提高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形成中华文化创新与传播的新局面，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取得新成就，迈上新台阶。

读史札记

从北大走出来的毛泽东

■ 程美东

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了北京，不久就职于北大图书馆。从此，毛泽东就与北大结下了历史性的渊源关系。从北大走出来的毛泽东，已然成为一位胸有利器、眼界宽阔的有为之士，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大成就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中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他在北大接触、了解并最终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这可以说是北大给予毛泽东最丰富的遗产！所以，从北大走出的毛泽东与此前相比较有了质的飞跃，因为他浸润了北大的精气神！

毛泽东在北大的成长得益于北大开放的精神，毛泽东在北大的成功经历丰富了北大精神，透过毛泽东的一生启示着北大未来的改革创新。

北大使命精神铸造了毛泽东

北京大学诞生于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时代，直接孕育于甲午战争的烟火和戊戌维新的热血之中，可以说北大是带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而诞生的。当年光绪帝所下《明定国是诏》中对于设立京师大学堂的目的说得很清楚：就是“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在当时的中国，“时艰”就是指外辱内乱，虽然大清皇室把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也作为“时艰”的考量范围，但对于当时的仁人志士来说，这个“时艰”主要就是指国家不独立、民族不富强、人民不幸福。

尽管北大在初创的一段时期经历了曲折，没有完全按照“共济时艰”的目的去发展，但在总体上它开始引领着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朝着新的方向发展。辛亥革命后，北大的发展进入到了新阶段，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日益浓厚，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更是以北大为基地，深刻地凸显了北大人对于中华民族的使命精神。

毛泽东成长的时代正是北大从无到有、从保守走向开放、从中国逐渐走向世界的过程，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对于毛泽东更是有了直接的巨大影响。可以说，在毛泽东还没有来到北京、来到北大之前，他就被以《新青年》为主要载体的北大人的思想和精神所感染了。身在湖南的毛泽东，很早就有救国救民的志向，在湖南一师的五年半时间里，他把立志、修身、求知、务实作为自己学习的基本取向，这个经邦济世的情怀突出表现在他对于真理追求的执着上，“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了北京，不久就职于北大图书馆。从此，毛泽东就与北大结下了历史性的渊源关系。从北大走出的毛泽东，已然成为一位胸有利器、眼界宽阔的有为之士，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大成就了毛泽东。

毛泽东来到北大工作，不是简单地北漂谋生，而是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基于如此的目的，他把图书馆员视为自己进一步开阔自己眼界、扩大社会交往面、深化自己知识的平台。他利用这个平台，接触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傅斯年、邓中夏等北大师生；利用这个平台，他旁听了北大的一些课程；利用这个平台，他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和新闻研究会，还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利用这个平台，他广泛阅读《新潮》《每周评论》等充满新气息的杂志。

总之，毛泽东虽然不是北大正式注册的学生，但是由于有在北大工作这个平台，他可以很容易参加北大的活动、学习和感染北大的思想、接触北大师生，这自然极大地提高了他的知识尤其是思想境界。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中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他在北大接触、了解、并最终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这可以说是北大给予毛泽东最丰富的遗产！所以，从北大走出的毛泽东与此前相比较有了质的飞跃，因为他浸润了北大的精气神！

毛泽东的成功实践验证和丰富了北大精神

对于中国人来说，北大被赋予了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和责任，一切体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积极的内容都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被国人视为北大的文化精神。所以，在今天我们讨论北大精神时，人们有多重的理解视角，或以为自由民主，或以为科学进步，或以为爱国创新，或以为追求真理。其实这些都体现了北大的文化精神，但在我看来，开放无疑是最能体现北大精神价值取向的内容。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身上得到确切的验证，也可以说毛泽东的成功实践从一个侧面丰富了北大精神。

第一，毛泽东在北大的成长得益于北大开放的精神。毛泽东能够在北大得到工作、学习，能够在北大接受马克思主义，实现其世界观人生观的根本转变，得益于北大开放的精神。正是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中，毛泽东如鱼得水，方便地阅读各种书刊，方便地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方便地参加北大的社团活动，并在这里与邓中夏等学生建立密切的联系。试想一想，如果没有开放的精神，作为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如何能够汲取那么多前沿的时代思想、如何能够融入到北大的生活当中？其实，不仅毛泽东得益于这种开放的精神，同时代很多的人都得益于北大的开放精神，在北大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归宿，实现了个人和社会的价值结合。毫无疑问，毛泽东的成功是无数得益于北大开放精神而成为有为人士的杰出代表。

第二，毛泽东在北大的成功经历丰富了北大精神。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告诉我们，北大要以巨大的社会责任感和开放性要求自己，不要把北大办成固步自封的、讲求门第出身的衙门，不要拘泥于教育教学的形式，要以向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为目的。凡有志于学者，北大就要双手拥抱；凡有志于中华民族复兴事业者，北大就要热情地帮助他，而不要看其学问大小、身份贵贱。北大精神不是自封的，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像毛泽东这样的从北大走出来的无数有为学子的人生经历所诠释出来的、体现出来的。由于有了毛泽东，北大倍加光荣，北大倍加令人向往，北大更加成为青年们理想的求学圣地。毛泽东的经历使人增加了对于北大的信任，这种信任确凿无疑地宣传和彰显了北大的精神，实际上也就是丰富了北大的精神！

透过毛泽东的一生启示着北大未来的改革创新

毛泽东一生是学习的一生。但是，他的学习不是固守在书斋，不仅仅借助于课堂。毛泽东从一个韶山冲的农家子弟走到湘乡、走到长沙、走到北大，求学是他的原初目的。可是，在这个求学的过程中，毛泽东没有把课堂、没有把读死书视为求学的主要途径，而是坚持自学、课外学习、自主学习、向社会学习、向生活学习作为主要途径，把经世致用作为学习的基本目标、价值取向，把德智体全面发展作为学习的基本内容体系。毛泽东没有正式上过现代大学，也没有显赫的家学渊源，但是无论是对于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还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都有精深的把握和良好的修养，这是一般的现代大学教育和传统的私塾教育都做不到的。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展现出来的知识、智慧更是一般的学校教育无法能够充分提供的。毛泽东的成才和成功之道给予中国的现代教育无疑提供了很多思考的空间。

新时代的中国面临全面深化改革的大问题，北大党代会曾经提出了“北大2048”远景规划和力争在第三个五十年的发展周期内实现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三步走”的战略设想，其基本内容就是：第一步，在北大建校120周年前后，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实现在本世纪头20年基本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第二步，用15年左右或更多一点的时间，继续加快创建，巩固提升，将北大进一步建设成为更高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第三步，再用15年左右的时间，大体上到北大建校150周年前后，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全面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并力争走在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完成北大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历史性跨越。

要想完成这个三步走的北大人之梦，必须要改革创新；北大改革创新需要借鉴人类一切积极的思想资源，毛泽东的成功经历和其独特的教育思想，以及其与北大的独特关系，自然是北大教育改革中首先需要借鉴和汲取的思想资源。

那么，北大到底从毛泽东身上可以汲取哪些积极的思想和启示呢？这个问题很大，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至少毛泽东对于北大以至中国未来的教育改革提供了两点启示：第一，北大需要把培养创新型人才放在第一位。毛泽东的创新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毛泽东个人的天赋，他的创新也是受教育的结果，只不过这种教育与常规性教育不同而已。如果我们掌握其内在的规律性，我们自然可以用在北大教育改革的具体体制机制的操作当中。第二，注重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知识的结合。毛泽东在这方面既有自己成功的事例，也有丰富的论述。当然，毛泽东对于北大教育改革的启示绝不限于这两点。但如果在这两点上，我们能做得很好的话，那么北大梦与现实的距离就会越来越短。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